

“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

——重温《论列宁》

□倪德刚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列宁划时代的伟大贡献永载史册。列宁去世不久，斯大林专门以《论列宁》为题高度评价了列宁。

山鹰与革命天才

斯大林说：当我知道列宁在《火星报》出版以后的革命活动的时候，我就深信列宁是一个非凡的人物。列宁和其他领导者比较起来不简单是一个领导者，“而且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其一，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其二，他与那些敲着敞开的大门，不敢走进屋子里面的人相反；他与那些“躺”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人相反。他始终不怕暗礁，大胆地向前游去。其三，他善于把复杂的事情表述的简单、明确和扼要，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颗子弹，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

列宁是为革命而诞生的。他是组织革命的天才和领导革命的伟大能手。在革命转折关头他洞察一切，他对各阶级的行动和革命进程了如指掌。

党的山鹰不畏惧，革命天才不怕革命。斯大林讲了两个事实。一是在十月革命前夜。形势十分严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起义风险很大。但是列宁不怕冒险，他断定：俄国起义一定会胜利，起义一定会结束帝国主义战争，俄国的起义一定会鼓舞西方受尽苦难的群众，起义的结果一定会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而苏维埃共和国一定会成为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堡垒。列宁的这个预见后来成为了现实。二是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形势更加严峻，叛乱军队不平息就永无宁日，不与德国暂时和谈就永无喘息之日。列宁毅然决定亲自到电台，他号召士兵停止军事行动，并主动同德国士兵联欢。这真是“冒险的一跃”。但是列宁不怕这“一跃”，因为他知道军

队希望和平，他知道用俄德士兵联欢的方式会争取和谈。“天才的远见，迅速抓住并看透即将发生的事变的内在意义的才能，——这就是列宁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革命运动转折关头的明确的行动路线。”

列宁成为党的山鹰和革命的天才，与他的特殊领袖素养直接相关。斯大林分析了无产阶级有两种类型的领袖：一种是风暴时期的领袖，实践家领袖。他们是有自我牺牲和勇敢精神的，但是在理论上很弱。另一种是和平时期的领袖，他们在理论上很强，但是在组织和实际工作方面却很弱。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 and 实际组织经验，而列宁却成功地把实践家同理论家集于一身。

不灰心与不骄傲

在困难面前不灰心才是真正的领袖。斯大林回忆说，在1906年的一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占了少数，遭到了失败。列宁丝毫不像那些失败后就灰心丧气的领袖。列宁鼓励大家：“同志们，不要灰心，我们一定会胜利，因为我们是正确的。”“不因失败而灰心”，这是列宁革命活动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把一切忠实和相信自己力量的人团结在他的周围。

在胜利面前不骄傲才是真正的领袖。斯大林回忆说，在1907年的一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成了胜利者。通常胜利会使某些领袖冲昏头脑，使他们骄傲起来。恰恰相反，正是在胜利以后，列宁特别警惕和戒备起来。他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第二件事情就是要不断地巩固胜利成果；第三件事情就是要彻底击溃对手。“‘不因胜利而骄傲’，——这就是列宁性格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冷静地估计对手的力量，保证党不遭可能发生的意外。”

逻辑力量与原则性

列宁的逻辑思维能够紧紧抓住听众，一步一步地感动听众。他的逻辑力量好像万能的触手，从各方面把你钳住，让人心服口服。

列宁坚持原则，他始终认为“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斯大林举两

个实例：其一，1909—1911年时期。这是很多人不相信党的时期；这是不仅知识分子，而且一些工人退党的时期。当时只有列宁一人没有随波逐流，而是高举党性的旗帜，以惊人的耐心和非常的坚忍精神，猛烈攻击无产阶级运动中所有一切的反对派，以非常的勇气和空前的凝聚力来捍卫党性。其二，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当时只有列宁一人，掀起了反对社会沙文主义的坚决斗争，揭露所谓的爱国主义者的变节行为。列宁知道，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在这个为国际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列宁成了胜利者。

“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就是列宁的公式，列宁用这个公式攻占了许多新的“不可攻占的”阵地，把无产阶级优秀分子争取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谦虚与相信群众

人民领袖是人民的领路人，领路人是与人民始终在一起的。列宁历来谦虚质朴，不愿意突出自己，不愿意惹人注目，更不愿意摆架子，这是列宁一贯的风格。斯大林举例说，通常“大人物”开会都迟到，而列宁却往往早到，躲在一个角落里亲切地同那些最普通的与会者谈话。这种谦虚使我们敬佩，列宁的这种谦虚是他最鲜明的性格。

对待群众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贵族态度。有些领袖虽然了解群众，也懂得革命的历史，可是他们有时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怕群众“破坏得太”。总想充当群众的保姆，竭力照书本去教导群众，而不愿意向群众学习，这种贵族态度是极其可恶的。

另一种是列宁式的态度。他总是鄙弃那些瞧不起群众，想照书本去教导群众的人。他总是不倦地教诲我们，要向群众学习，要尊重群众的行动。他总是相信群众的创造力。相信群众，这是列宁实践活动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把群众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正因为列宁具有不灰心、不骄傲、坚持原则、相信群众等品质，所以，斯大林说，列宁把共产党培养成为世界上最坚固最有锻炼的工人党；列宁的伟大在于创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列宁不仅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而且是全球劳动世界的领袖。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奋斗。阮青、马彦涛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编著了《增强斗争本领》一书，由国家行政管理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部立足现实国情、具有鲜明问题导向、融通不同学科的著作。该书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了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保持斗争精神，增加斗争本领。该书以新颖独到的视角、权威翔实的资料、通俗易懂的语言，充分地阐述了新时代要“自觉”和“敢于”斗争。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形势更为严峻复杂。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保持斗争精神。该书用两章的篇幅论述这个问题，体现了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历史使命感。

该书从斗争使命、方向、方法、原则和规律五个方面，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增加斗争本领的着力点和主要抓手。党政干部必须紧紧围绕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历史使命，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目标决定着斗争方



向。斗争是一门艺术，要善于斗争，中国共产党需要讲究斗争方式方法，不断提高应对社会复杂局面的本领。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原则。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设社会主义要求党政干部不断总结斗争规律。

该书突出新时代斗争精神的实践导向，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实际和广大干部的思想实际，深入探讨了如何在面临各种严峻挑战和各种复杂环境下发挥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对于广大干部自觉投身疫情防控斗争，对于夺取疫情防控斗争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胜利有重要的价值。该书面向的读者面比较广泛，不仅可以成为专业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目，也可以成为党政干部的学习参考资料。

□郑吉伟

新时代斗争精神的



《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5期目录

【本刊专稿】	
国家行政体制的发端及演化阐释	许耀桐
【疫情防控与国家治理笔谈】	
“四型”社会建设：未来社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疫情“大考”之后的社会建设路径	龚维斌 张林江
新形势下加强援外医疗工作的着力点	李云霞 马宝成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物安全治理短板	何建堂 张孝德
【社会治理】	
文明城市的全要素发展模式研究	
——以乙市CIVILIZED经验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课题组
社会治理实践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王伟进 毕蔚兰 吕少德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抗“疫”复产期经济增长新动能	王健 王立鹏
【脱贫攻坚】	
中国减贫的奇迹：制度变革、道路探索及模式创新	张琦 张涛 李凯
多源流理论视阈下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议程分析	
——以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为例	卫志民 胡浩
【法治政府】	
区域法治：一个跨学科的新概念	
新《证券法》下复杂资管产品的监管构建：路径与逻辑	戴小明
【比较与研究】	
城市文化场景的构建机制研究	王静 张昊
——以加拿大多伦多市为例	范为

著名法学家张晋藩先生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他曾三次为中央领导讲课。他对中国监察法制史有着深入的研究，曾著述、主编《中国法制通史》《中国古代监察法制史》《中国近代监察制度与法制研究》等多部专著和教材，发表相关论文多篇，引领学界深化对中国监察法制史的研究，以史为鉴，咨政建言，对中国当代监察体制改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梳理与总结

张晋藩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产生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是土生土长的，它的发展有自己的历史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1986年7月，他发表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浅析》一文，提倡从法制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此后，他又发表了《中国古代监察法的历史价值——中华法系的一个视角》《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的权力地位与监察法》《中国古代监察思想、制度与法律论纲——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国古代的治国之要——监察机构体系与监察法》等多篇论文。在论文之外，张晋藩先生还出版了专著《中国监察法制史稿》，主编《中国古代监察法制史》和《中国近代监察制度与法制研究》。既在时间上贯通了古代、近代两大阶段，也在内容上融监察思想、监察制度、监察法律、监察人物于一体，集中反映出中国监察法制的源流演变、立法经验、丰富内涵和具体成就，从思想、制度与法律等方面对中国监察法制的演变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和总结。

从战国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从地方到中央，由简单的单行法规到完备



治学与咨政

——张晋藩先生对中国监察法制史研究的贡献

□焦利

的监察法典，张晋藩先生对中国古代监察法梳理后得出结论：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文化氛围中产生的中国古代监察法，以其特有的制度建构、多元的监察体系、全面性的监察规范，鲜明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在运用法律约束权力、规范权力的运行方面的伟大创造力。

研究与提炼

张晋藩先生在《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一书中指出，“失去传统就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特点，就失去了前进的历史与文化的基础。我们需要从固有的法律传统中，引出滋润了五千年中国的源头活水，需要科学地总结和经验有价值的因素”。他认为，廉政法制是中华古代法制文明的亮色。作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和中华法系的重要表征，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封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制衡机制。它的基本任务就是整肃百官，以充分发挥官僚机构的作用，实现社会的调整功能。历代监察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不仅有效地规范了各级官吏的行为，还对古代政治权力乃至最高权力的运行，起了一定程度的规束与匡正作用。它的价值不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也给当代的监察制度与法制建设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

借鉴。因此，张晋藩先生对中国古代监察法可资借鉴的精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提炼。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监察权力的运行法律化。为了对监察权力的组织和运行进行全方位的规范和控制，历代统治者都有针对性地制定了相应的监察法。不仅使监察官奉法行事，将监察权力的行使纳入法律的基本轨道，而且保证了监察制度的稳定性，对于庞大的官吏群起到心理上的震慑和实际的防范与惩戒作用。

二是固定监察与临时监察相互配合。中国古代不仅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了固定的监察区和监察机关，以实现坐镇监察的效能，同时还实行监察官不定期地或专项巡察地方的监察方式，以克服单纯依靠坐镇监察的被动性。这种固定和临时相结合的监察方式，成为历代长期沿用的模式，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监控，维护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三是严格监察官的任职条件与违法制裁。中国古代监察官位卑而权重，因此监察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监察效能的发挥。从秦汉时起，便十分重视对监察官的选任。隋唐以后，在监察法和皇帝颁发的有关诏令中都严格规定了监察官的任职条件。首要的是具有清正刚直、疾恶如仇的品质；其次要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进士出

身者优先录用；再次必须拥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了防止监察官擅权专横、失监虚监，不仅制定了监察官的互监互察制度，还严格规定监察官如违法失职，加重处罚。

反思与镜鉴

在对中国传统监察法制的研究过程中，张晋藩先生十分鲜明地提出：“正像中国古代法具有二重性一样，古代监察法也是既有民主性精华，又有封建性糟粕，因此研究和探讨中国古代监察法应该剔除其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

虽然中国古代社会的监察立法相当发达，监察组织也比较完善，但由于监察权直接附属于皇权，因此，监察机关及其成员只是专制君主安插在官僚体系中的“耳目之司”。监察机关权力的大小往往视君主的信任程度和主观好恶而定，不具有独立性，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其作用的发挥。

由于监察法和其他法一样，在古代都是皇权的御用工具，所以张晋藩先生经常在文章中反思法律工具主义的危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肃清法律工具主义的影响，牢固树立法律权威主义的理念。他说：“法律工具主义不仅影响了整个古代社会，也包括近代社会。想起用法就把法拿出来，不想用法就把法收起来。所以今天我们要

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的法律权威主义的理念，就必须肃清法律工具主义的残余影响。”“经验证明，对传统的反思越深刻、越彻底，越能准确地撇其精华，弃其糟粕，从而创造出反映时代特色的中华法系。”张晋藩先生就是这样在对传统监察法的深刻反思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剖析王朝兴衰之由，探索民族复兴之路。

咨政与建言

张晋藩先生认为，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是过去，但面对的是现实。法制史学的研究，不能像清代考据学派那样钻故纸堆，为历史而历史，而是既要深入历史，又要跳出历史，站在法制建设的高度，科学地总结法制历史的经验和科学性的认识，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服务，这是法制史学生命力之所在。

正因为如此，张晋藩先生的研究成果也一直受到高层的重视。1986年第一次普法期间，张晋藩先生应邀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律课，题为《谈谈法制历史经验的借鉴问题》。1995年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讲授法律课，讲题为《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1998年再次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讲课，讲题为《中华法制文明的世界地位与近代化思考》。三次讲课题目不同，内容各异，但贯穿的主

线则是一致的，即为当前的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同样，中国传统的监察法律和制度也给当代的监察法制建设和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借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和监察体制改革工作。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大幕徐徐拉开，张晋藩先生也积极发表相关文章，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建言献策。2016年，张晋藩先生发表《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的权力地位与监察法》一文，从监察机关的设置、监察法的制定、监察权的地位、监察官的选用、御史巡按地方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和监察法对今天的借鉴价值。2017年4月，张晋藩先生接受《中国纪检监察报》采访，再次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建言献策。今天，我们欣喜地发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发展进程和阶段性成果竟然与张晋藩先生的建言多数吻合。比如，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且与一府两院并列；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加强巡视制度；“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公职人员的监督，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等等。

张晋藩先生说：“5000年的中国历史，是一个宏大的智库，有取之不尽的经验，是惠于我们中华民族子孙最大的财富。”张晋藩先生几十年来在这个宏大的智库中看成败、鉴得失，探求兴替之道，九十高龄依然笔耕不辍，为“经国序民，正其制度”提供科学的历史借鉴，其学术成果令人惊叹，其抱负情怀令人仰慕！